

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演进轨迹

陈萍

(重庆广播电视大学,重庆 400052)

摘要:文革结束后,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20世纪80年代初的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有合谋的倾向,因此,一些学者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启蒙主义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走向了分化,但是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仍然具有存在的理由。

关键词:启蒙;新启蒙主义;思潮;新时期;演进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9)06-0140-04

一、启蒙的开启、中断与复归

中国现代文化的开启是由五四启蒙运动来承担的。启蒙的向度就是反传统与追求现代性。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所谓启蒙,也就是一种“去蔽”,把人从蒙昧状态中释放出来,使之独立思考,勇敢地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在欧洲,“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移位和欧洲的完全更改”^[2]。在20世纪的中国,启蒙运动一直以“重估定一切价值”的激进姿态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中国寻求西化现代性的文化前景。

五四时期,新派知识分子曾不遗余力地反叛传统,宣传以科学、民主、自由和个体价值为核心的西方现代观念,掀起了一场现代性的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五四新文化运动因其激进的启蒙色彩而在中国的思想文化变革中抹下了重重的一笔,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由于内乱或外患,启蒙的进程屡屡遭受挫折,尤其是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被虚幻而强大的集体主义所淹没,启蒙主义传统在非常态的政治社会环境中无法延续。

文革结束后,配合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五四的启蒙主义传统被新时期的知识分子重新拾起,作为推进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资源。五四启蒙主义传统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承续,始于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

收稿日期:2009-06-1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07JC51011)

作者简介:陈萍(1964-),女,重庆彭水人,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研究。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社 <http://qks.cqu.edu.cn>

1977年《班主任》的发表,预示着启蒙主义文学新时代的开启。最初的启蒙命题的复归走的是近代启蒙主义以及五四问题小说的思路。如《伤痕》,它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学院感情的破碎把现代专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深刻地描写了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对文革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进而中国当代作者将目光推向更远处。《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大跃进”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等反思“反右”扩大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3]。在对文革为代表的极左时期进行的一系列反思中,知识界策略性地把这段时期的文化系统判定为封建性质,顺理成章地恢复了五四启蒙主义的精神话语。其后,经过关于“主体性”和“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恢复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话语体系,五四文学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弘扬。

二、启蒙主义向新启蒙主义的转换

启蒙主义是何时转向新启蒙主义的呢?

有关新启蒙的论述,都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启蒙主义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合谋倾向。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告别“文革”的前提下,配合“思想解放”、“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宏伟叙述,“新启蒙主义”展开其意识形态实践——更准确地说,后者正是前者的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开明派”与精英知识分子(二者也是相互渗透)的鼓动、参与下,在“新时期”这个神话时间的伟大起点上,迎合了逝去未远的集体性的创伤性记忆,“新启蒙主义”迅速成为主导性的思想潮流,获得了强大的合法性和感召力,成为解释历史、塑造未来的思想力量:通过“反专制”、“反封建”的叙述,它以隐喻的方式将“失效的”实践界定为蒙昧时期,将融入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标举为一种普世的道路^[4]。确实,最初的“新启蒙主义”思潮是在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活动的^[5]。

鉴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启蒙运动与国家意识形态的亲状态,许纪霖把新启蒙主义话语的正式形成推迟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如果说社会/政治变革的源头是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话,那么,作为新启蒙运动前身的思想解放运动,则起源于稍早一些的真标准问题大讨论……到了改革和开放加速发展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却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首先是因为周扬等人都是体制中人,虽然不再处在权力的中心,但不少人仍然居于体制的核心地带,一方面众所瞩目,另一方面也是靶心所在,当1984年初主流意识形态以‘清理精神污染’为名对之打压时,体制留给他

们回旋和发挥的空间便越来越狭隘。思想解放运动欲保持与发展自己的思想成果,必须在体制的边缘和体制之外,开拓一个新的思想空间。其次,‘以复古为解放’的思想解放运动,既然已经逼近了原典,那么其内在的逻辑便决定了非从老祖宗那里解放出来,便无法继续向前发展的定势。事实上,现代化改革实践中提出的大量问题已经远远不是马克思早期思想所能解决得了的。因此,中国思想运动不得不以一种新启蒙的方式容纳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这样,作为思想解放运动逻辑和历史发展顺乎自然的结果,新启蒙运动便呼之欲出了……新启蒙运动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延续,但它的重心却发生了变化。如果说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政治变革的话,那么,新启蒙运动的诉求却转移到了所谓的‘文化的现代化’上。”^[6]汪晖也指出1984年后新启蒙主义的变化态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生的针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之后,“新启蒙主义”思想运动逐步地转变为一种知识分子要求激进的社会改革的运动,也越来越具有民间的、反正统的和西方化的倾向^[5]。如果充分考虑到新启蒙主义的新特质,我们倾向于把1984年后的启蒙主义称为新启蒙主义。

学术界关于新启蒙主义的具体含义以及与五四启蒙主义的区别,并没有形成严密系统的解说。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启蒙文学研究的张光芒认为:“作为文学启蒙的逻辑前提,历史带给新时期与‘五四’的文化障碍及由此激发的思想反弹力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五四’文学来说,‘救亡’的时代主题与‘立人’的启蒙任务是以胶着的状态纠缠在一起的,理想人格的建构与形而上层面上的人性开掘受到过多的救亡与革命因素的干扰,纯粹的唯人主义的人学本体论难以建立起来。时至20世纪70年代末,民族危亡问题退居其次,民族内部的政治/文化问题突显,在经历了短暂的社会/政治学层面的思想解放运动后,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很自然地成为启蒙主义思潮回归与嬗变的首要主题。”^[7]五四启蒙思潮对西方文化大致持全盘接收的态度,比较而言,“新启蒙运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想运动,既有渴慕西方现代化的同质性诉求,又有对其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潜在性格”^[6]。汪晖看到了新启蒙主义思潮与政治问题、国家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新启蒙主义’思潮并不是统一的运动,这个思潮中的文学和哲学方面与当时的政治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如果简单地认为中国当代‘启蒙思想’是一种与国家目标相对立的思潮,中国当代‘启蒙知识分子’是一种与国家对抗的政治力量,那就无法理解新时期以来中国思想的基本脉络。尽管‘新启蒙’思潮本身错综复杂,并在1980年

代后期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但历史地看,中国‘新启蒙’思想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意识形态的基础。”^[5]王岳川在人文精神失落的后乌托邦语境下来理解新启蒙,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

新启蒙是知识者走出启蒙误区的“新觉醒”。它关涉这样一些问题:启蒙不是赋予知识者的特权,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教诲和指导,相反,启蒙首先是每个个体自我心灵的启蒙,是去掉虚妄张狂而使自我认清自我、知悉自己存在的有限性和可能性,洞悉自我选择的不可逆性与自我承担选择的结果^[8]。

三、新启蒙主义的分化及走向

以1984年为正式起点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通过对五四的历史重构,在态度上具有“同一性”。这种“同一性”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借助现代化理论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体现出“对西方现代化终极目标理想化的渴望”,“对现代化前景作出普世性的承诺”。^[6]“一般来说,1980年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普遍地信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而其预设就是建立在抽象的个人或主体性概念和普遍主义的立场之上的”^[5]。

随着20世纪90年代新的社会政治格局的更加稳定,尤其是1992年以后经济改革加速,市场社会在中国全面登场,使得知识份子对中国改革的现实、道路和发展前景的分歧大大加深,原先的‘态度的同一性’不复存在,思想界的裂缝越来越深,以至达到无法弥补的程度”^[6]。新启蒙主义整体上肯定西方现代性的文化立场受到了新保守主义的强烈质疑,一些新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也意识到作为社会目标的“现代化”可能导致价值的危机,一些早先的启蒙主义者转而吁求传统的价值,特别是儒家的价值,王晓明等则吁求重建“人文精神”。许纪霖认为新启蒙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思想界的分化和断裂是通过三波分化而完成的。第一波分化是“思想”与“学术”的分化,新启蒙主义“趋新骛奇、泛言空谈”的空疏、浮躁的学风受到一些知识分子的指责,学界出现“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出”的明显趋势。新一轮的民间学术杂志《学人》、《原学》等创办,体现了一部分启蒙知识份子转向了学术化和知识化,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在相当的程度上就是这一学术化转向的知识性产物。坚持“思想”和主张“学术”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分歧在于对启蒙的看法上,即在20世纪90年代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继续启蒙?有相当一批人是完全告别了启蒙,尤其是一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关怀,在国家控制的学科化知识体制中,执

衷于做一个专家型的知识人。但其他一些“学术”型知识分子,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的过来人,通过对五四运动中激进主义的反思和文化保守主义历史价值的重新发现,实际上对启蒙有了另一种新的理解,即启蒙的深化不能仅仅靠浪漫主义的思想激情,更重要的是要有学理的深厚基础;与其不断地追逐潮流,不如对西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学理研究;对于传统的研究也必须抛弃立场优先的价值评判态度,而代之以知识论的分析方法,以“同情性的理解”重新阐释传统。第二波分化是人文精神与世俗情怀的分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以市场为中心的消费社会出现,使人们在20世纪80年代所呼唤的现代化目标部分兑现。现实的急剧改变促使新启蒙知识分子内部发生了更深刻的分化。以“二王”(王蒙和王朔)为代表的一些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分子,热烈地欢呼市场经济的来临,将之视作彻底铲除极“左”根源、实现世俗幸福的必由之路。并且以“躲避崇高”式的虚无主义立场,否定一切形式的理想主义。而另一些打着后现代主义旗号的文化批评家,将当时在中国出现的大众消费文化解释为一种普世性的“后现代文化”,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现代性”已经终结,一个与世俗社会拥抱的“后新时期”正在降临。与此同时,生活在中国金融和商业中心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更多地感受到的却是金钱文化和商业霸权对文化人和人文事业的压迫,他们在1994年《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人文精神系列对话,旨在重新高扬文化启蒙的旗帜,回击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工具理性压倒一切的市场社会中重新寻回失落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并因此与上述两批具有世俗情怀的知识份子发生了激烈的论战。后来,在人文精神的拥护者中,又悄悄地分化为两支:温和的一支继续从知识论的层面反思现代化的幽暗面;另一支以“二张”(张承志、张炜)为代表,以一种极端的道德理想主义姿态,激烈抨击世俗社会,并逐渐演变为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民粹主义。第三波分化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化。“总而言之,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通过三波分化,新启蒙运动所建立的脆弱的同质性已经完全解体,无论在目标诉求/价值指向、还是知识背景/话语方式上,都发生了重大断裂,变得不可通约”^[6]。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分化,受到新保守主义的挑战,为“现代化”这个更为宏大的话题所吞噬,被后现代主义文化幻想所掩盖,从而被边缘化,淡出了知识分子的关注视野。但是,仍然有少数学者在坚持新启蒙主义立场,如李慎之、徐友渔、张光芒等。张光芒在《“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一文中认为,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

时,而且是当务之急。张文分析了五四启蒙、20世纪30年代启蒙与20世纪80年代启蒙的不足,指出这几场启蒙运动都是“未完成时”,“向外的趋向均大于向内的趋向,社会启蒙的成分大于‘人’的自身启蒙的成分,缺乏信仰纬度的呵护与标高,因此上述‘新启蒙’必然会蜕变为‘旧’的”。张文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出发,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提出了不同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来拯救流行的“偏见”。在张文看来,偏见滥用了“人性解放的条件,成为新的习俗、时尚所裹挟的人性迷乱状态。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充满了‘傲慢和偏见’的现代人自以为自己的人性的解放了,自以为可以‘看透’社会与人生的方方面面,但其实,他也许已经陷入人性的迷障而不能自拔”。因此,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人性上升—人格完成,这样的“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9]。张光芒面对当下社会的“偏见”,张扬“人性的自由”,强调“自我启蒙”,无疑具有一定的学理性和现实针对性。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启蒙运动“没有最后一幕:如果人类的思想要解放的话,这是一场世代都要重新开始的战斗”^[10]。确实,启蒙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和自我反思的文化立场和话语方式,应该永远具有存在的理由。持新保守主义文化立场的杜维明在批判“启蒙心态”时,也承认“作为‘五四运动’的传人,我们不论对传统文化采取

何种态度,都是西方启蒙的受惠者”^[11]。不过,从总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启蒙主义日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逐渐丧失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康德. 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C]// 何兆武,译.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2]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3] 葛红兵. 中国现代文学精神[J]. 学术季刊,2002(1):183-192.
- [4] 刘复生. “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J]. 文学理论与批评,2004(1):15-20.
- [5] 汪晖.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 文艺争鸣,1998(6):7-26.
- [6] 许纪霖. 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J]. 二十一世纪,1998(12):4-13.
- [7] 张光芒. 人性解放“三部曲”——论新时期启蒙文学思潮[J]. 南京大学学报,2003(1):136-145.
- [8] 王岳川. 中国百年学术思想嬗变的基本问题[J]. 社会科学战线,1995(5):37-46.
- [9] 张光芒.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J]. 人文杂志,2005(1):9-15.
- [10] 阿伦·布洛克.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 北京:三联书店,1997:127.
- [11] 杜维明. 化解启蒙心态[J]. 二十一世纪,1990(12):12.

The Evolution of New Enlightenment

CHEN Ping

(Chongqing Radio and TV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5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May 4th tradition of Enlightenment was resumed by the intellectuals of new era. Early 80s enlightenment tended to conspire with the national ideology, therefore, some experts apted to nominate the Enlightenment post-1984 as New Enlightenment. New Enlightenment, not only had the demand for the homogenization with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but also had the potential character that would critically reflect it. Since 1990s, New Enlightenment has gradually lost its capability of the criticism and diagnosis for social 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ven it goes splitted, Enlightenment still has a *raison d'être* as a cultural standpoint and a mode of discourse in term of social criticism and self-reflection.

Key words: enlightenment; new enlightenment; ideologic trend; new era; evolution

(责任编辑 彭建国)